Journal of Research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ISSN: 3068-479X)
中国基督教研究（ISSN：3068-479X）| CCSpub.cc/JRCC | CC BY-NC-ND 4.0
2026 年 12 月第 27 期，第 222-263 页 | No. 27, 2026, pp. 222-263

耶稣会士阳玛诺在华活动考述（1610–1659）

谢温欣 https://orcid.org/0009-0004-2340-809X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wenxingabriela@163.com

摘要：耶稣会士阳玛诺是明清中国天主教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阳玛诺于 1610 年进入中国内地，1659 年在杭州去世，在华约半世纪。阳玛诺曾进京翻译西洋天文历法书籍，受荐参与招募葡兵与引进西洋大炮，历经韶州、南京、福建教案，两次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长达十八年，先后传教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作为在华耶稣会的领导人物，阳玛诺在南京教案后恢复耶稣会在华活动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在担任耶稣会首任中国副省会长期间促进了传教区的稳定和发展。阳玛诺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叶向高等信教、友教人士交往密切，致力于将译书修历计划付诸实践，编撰了数本天文与宗教书籍，推动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受到中国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塑造，阳玛诺继承了利玛窦的适应策略。

关键词：阳玛诺、耶稣会士、适应策略、利玛窦规矩、天主教史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612_(27).0008

投稿日期：2026 年 7 月 22 日

接受日期：2026 年 8 月 18 日

刊登日期：2026 年 11 月 9 日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Manuel Dias Júnior, 1574-1659），1610 年入中国内地传教，1659 年卒于杭州，在华近半个世纪。阳玛诺曾受荐进京译书修历、募兵铸炮，历经韶州、南京、福建教案，两次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长达十八年，先后传教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著有《天问略》《圣经直解》《轻世金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诠》等书，是明清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迄今为止，学界对阳玛诺所著《天问略》等著作关注较多，而对其在华活动的研究则相对不足。[1]由于既有研究对耶稣会史料的系统发掘仍不充分，阳玛诺的生平，其在南京教案、译书修历、译名之争等事件中的活动，以及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发展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尚未得到应有重视。因此，本文将利用阳玛诺等耶稣会士书信、耶稣会中国年信等西文手稿档案，结合中文资料，完整考述阳玛诺在华事迹，呈现阳氏个人形象及其在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一、在华早期：译书修历、南京教案与重返京师（1610-1623）

1574 年，阳玛诺生于葡萄牙卡斯特罗·布朗科（Castelo Branco），1593 年 2 月 2 日加入科英布拉耶稣会初修院，1596 至 1600 年于耶稣会学院学习哲学，

1 费赖之、荣振华、方豪撰有阳玛诺小传，是研究者参考之基础：费赖之（Louis Pfister）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 110-115 页；荣振华（Joseph Dehergne）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 184-186 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 122-123 页。陈占山的《葡籍耶稣会士阳玛诺在华事迹述考》似唯一专述阳玛诺在华事迹的论文，但囿于史料匮缺，叙述较为粗略，见《文化杂志》1999 年第 38 期，第 87-96 页。另有学者对阳玛诺参与修历译书一事有所涉及，但重点在于阳氏所著《天问略》，见姚立澄，《关于〈天问略〉作者来华年代及其成书背景的若干讨论》，《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156-164 页；Henrique Leitão, "The Contents and Context of Manuel Dias' *Tianwenlüe*," in Luís Saraiva and Catherine Jami eds.,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I: The Jesuits, the Padroado and East Asian Science (1552-1773)*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8), pp. 99-121.

1601 年 4 月 11 日前往印度。[1]阳玛诺在写于 1616 年 9 月 15 日的书信中称自己“来东方已十五年，果阿三年，澳门学院六年，中国内地六年。”[2]《圣教信证》亦载：“阳玛诺，字演西，路西大尼亚国人。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至。”[3]故阳玛诺于 1604 年从果阿前往澳门，1610 年入中国内地传教。

1611 年，阳玛诺与费奇规（Gaspar Ferreira, 1571-1649）传教韶州。次年，因韶州城中官员、僧人和百姓反对，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城，被迫放弃韶州住院。[4]随后，阳玛诺和费奇规前往南雄。因费奇规与南雄官员相识，耶稣会士受到友好对待，并在南雄建立教堂。[5]对于刚接触中国教务的阳玛诺来说，韶州教案如同一个下马威，阳氏应意识到谨慎行事和结交中国官员的必要性。

1610 年，因日食预报错误，朝中呼吁改历，礼部遂奏请翻译西洋历法书籍。[6]耶稣会士积极参与译书修历的筹备，认为该计划有助于在华传播天主教。[7]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特别指出，历算是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开辟传教点的最佳手段之一，应派遣两到三名神父致力于译书而留其他神父发展

1 Henrique Leitão, “The Contents and Context of Manuel Dias’ *Tianwenlüe*,” pp. 99-100;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 185 页。

2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assistente da província de Portugal em Roma (阳玛诺，《致驻罗马的葡萄牙教省参赞神父》), 1616.9.15, Macau, ARSI, JS, 17, fl. 10.

3 韩霖、张赓，《圣教信证》，载张西平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38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第 46 页。路西大尼亚国（Lusitânia），即葡萄牙。

4 Niccolò Longobardo, Carta ânua das residências da China do ano de 1612 (龙华民，《1612 年耶稣会中国住院年信》), 1613.2.20, Nanxiong, ARSI, JS, 113, fls. 248-248v.

5 Manuel Dias Sénior, Carta ao padre provincial da Índia (李玛诺，《致耶稣会印度教省会长神父》), 1612.12.8, Macau, ARSI, JS, 15-Ⅱ, fls. 204v-205.

6 《明神宗实录》卷 490，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第 9219-9220 页。

7 Niccolò Longobardo, Carta ânua das residências da China do ano de 1612, fls. 219-220v.

教务。[1]1612 年 9 月，龙华民离开北京，前往南雄，11 月下旬前抵达。[2]此时，阳玛诺应也在南雄。龙华民可能发现了阳玛诺的中文著书才能及其掌握的天文知识，故派阳氏前往北京，参与译书修历。

1613 年，李之藻（1571-1630）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举荐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6）、龙华民、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1620）和阳玛诺翻译西洋历法书籍。[3]阳玛诺正是借此机会首次进京。1613 年 5 日，阳玛诺已居于北京。[4]1614 年的某段时间里，阳玛诺和熊三拔在利玛窦墓园居住了近二十天，期间阳氏完成了《天问略》。[5]

译书修历计划体现了利玛窦采取的科学和书籍传教方法，但这一适应策略在耶稣会内部并非没有争议。时任耶稣会日本教省会长瓦伦丁·卡尔瓦略（Valentim Carvalho, 1559-1630）反对耶稣会士参与修历，令阳玛诺巡阅传教区并宣布禁止传教士向中国人教授数学、天文知识的命令。[6]1615 年初，阳玛诺与庞迪我居于北京。此年晚些时候，阳玛诺收到指令，开始巡阅。据龙华民写于 1615 年 11 月 27 日的书信，“由于日本教省会长无法亲自前来，便令阳玛诺神父替其

1 Niccolò Longobardo, Informação da missão e casas da China do ano de 1613 (龙华民，《1613 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与住院信息》), 1613.4.13, Nanxiong, ARSI, JS, 113, fl. 293v.

2 Sabatino de Ursis, Principiam as notícias do ano de 1612 (熊三拔，《1612 年消息》), Beijing, BA, JA, 49-V-5, fl. 124; Niccolò Longobardo, Carta ao padre Claudio Aquaviva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龙华民，《致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1612.11.21, Nanxiong, ARSI, JS, 15-II, fls. 195-196v.

3 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载郑诚辑校，《李之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第 18-23 页。

4 Niccolò Longobardo, Carta ao padre Claudio Aquaviva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龙华民，《致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1613.5.14, Nanxiong, ARSI, JS, 15-II, fl. 269.

5 Sabatino de Ursis, Principiam as notícias do ano de 1614 (熊三拔，《1614 年消息》), Beijing, BA, JA, 49-V-5, fls. 148v-149.

6 Sabatino de Ursis, Carta ao padre Nuno Mascarenhas assistente da província de Portugal em Roma (熊三拔，《致驻罗马的葡萄牙教省参赞马什卡雷尼亚什神父》), 1617.12.2, Guangzhou, ARSI, JS, 17, fl. 108.

巡阅住院，因此阳玛诺神父正在进行他的巡阅”。[1]

目前尚未发现阳玛诺本人对卡尔瓦略禁令态度的记载，撰写《天问略》和传达禁止历算的命令似存矛盾。但回顾阳玛诺经历可知，阳氏进入传教区不到三年便在龙华民的派遣下前往北京，且达到上级预期完成了《天问略》，随后又受命巡阅传教区并宣布卡尔瓦略禁令。阳玛诺应是按照传教区上级的命令行事，这一矛盾体现了阳氏的服从性。此外，阳玛诺在《天问略》正文开篇称“最高者即第十二重为天主上帝”及其自序中“造物主”、“天主”、“真主”等语，[2]较为直白地将天主教植入一部为修改中国历法而作的历算书中，无怪乎四库馆臣称其用意极为诡谲，故删去原序。[3]阳氏此举，既是 17 世纪天主教欧洲知识一体性的客观体现，也是耶稣会士借科学引入神学而刻意为之的主观行动。无论如何，阳玛诺已践行了利玛窦所采取的适应策略。

就在耶稣会士为是否参与修历争论之时，南京教案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五月，[4]沈潅上《参远夷疏》，揭开南京教案序幕。七月二十一日，耶稣会士王丰肃（Alfonso Vagnone, 1566-1640）、谢务禄（Alvaro de Semedo, 1585-1658）及数名教徒被捕。八月，沈潅上《再参远夷疏》。十二月，沈潅上《参远夷三疏》，得旨驱逐传教士。于南京被捕之王丰肃、谢务禄[5]与在京之庞迪我、

1 Sabatino de Ursis, Principiam as notícias do ano de 1615 (熊三拔，《1615 年消息》), Beijing, BA, JA, 49-V-5, fl. 154v; Niccolò Longobardo, Carta ao padre Nuno Mascarenhas assistente da província de Portugal em Roma (龙华民，《致驻罗马的葡萄牙教省参赞马什卡雷尼亚什神父》), 1615.11.27, Nanxiong, ARSI, JS, 16-Ⅱ, fl. 234v.

2 阳玛诺，《天问略》，载张西平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2 辑第 3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第 119-234 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 895 页。

4 本文中历年月日采用汉字表示，西历则用阿拉伯数字。

5 教案平息后再进入内地时，王丰肃改名高一志，谢务禄改名曾德昭。

熊三拔被遣返至澳门。[1]

阳玛诺虽名列沈潅所控告的耶稣会士之列，[2]但恰因其前往澳门汇报巡阅情况而躲过抓捕。1616 年 3 月 18 日，在京耶稣会士已收到阳玛诺写于南昌的书信。[3]早于 1616 年 9 月 15 日，阳氏已抵达澳门，且已向卡尔瓦略和时任耶稣会日本—中国巡阅使维埃拉（Francisco Vieira, 1555-1619）汇报了巡阅情况。此时阳玛诺尚不知教案爆发，着手返回传教区，计划再带几名传教士进入内地。该年底，阳玛诺得知耶稣会士和教徒被捕，暂时放弃返回内地。[4]

在 1616 年 12 月 26 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斯奇（Mutio Vitelleschi, 1563-1645）的书信中，阳玛诺根据从内地寄来的信件，向总会长汇报了教案经过、爆发原因以及教徒表现。特别重要的是，阳玛诺详细说明了他对传教方式的看法和建议，包括如下四点：第一，南京住院过于引人注目，应按照中国建筑风格修建朴实、低调的房屋。这一点回应了沈潅对耶稣会士的指控，即传教士在南京重地洪武岗旁和孝陵卫前筑屋定居，“起盖无梁殿，悬设胡像，诳诱愚民”。[5]第二，在服饰和衣着上更加简朴，以免引起中国人的议论。上述两点说明阳玛诺采取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亦体现其朴实、谨慎的性格。的确，由于教案的打击，

1 关于南京教案，可参见张维华，《南京教案始末》，载《晚学斋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6），第 493-518 页；万明，《晚明南京教案新探》，载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 141-155 页；周孝雷，《巡城御史孙光裕参与南京教案史实考论》，《世界宗教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16-131 页。关于教案中天主教徒的活动，参见肖清和，《“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 84-127 页。

2 沈潅，《参远夷疏》，载周岩编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下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第 1697 页。

3 Sabatino de Ursis, Principiam as notícias do ano de 1616 (熊三拔，《1616 年消息》), Beijing, BA, JA, 49-V-5, fl. 174v.

4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assistente da província de Portugal em Roma, 1616.9.15, fl. 10.

5 沈潅：《再参远夷疏》，载周岩编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下册，第 1701 页。

耶稣会士藏身于教徒家中，行事方式更为低调温和。[1]第三，阳氏认为宫中宦官有助于传教，应多加结识，并安排一名神父居于利玛窦墓园中，以同宦官交往。阳玛诺居于北京期间，曾在墓园招待宦官，同其享用吃食，谈论天主之事。当时，北京住院的熊三拔极力支持同宦官交往，而庞迪我则相当反对，或因资金缺乏及庞氏反对，卡尔瓦略命令耶稣会士不再居于墓园。[2]在此事上，阳玛诺与熊三拔的意见一致。第四，应竭尽所能结交重要官员。在阳玛诺看来，宦官与文人士大夫皆为耶稣会士打通宫廷内部的重要渠道，是最终赢得皇帝许可传教的主要途径，在有权势之人的庇护和帮助下，耶稣会将在中国安全立足，天主教也会在中国合法传播。[3]

在阳玛诺撰写该封书信时，沈潅尚未上第三疏，前两疏亦未获批，因此阳氏对传教区形势相对乐观。但阳玛诺始料未及的是，尽管他迫切希望返回内地，但这场教案使他在澳门滞留三年之久。1618 年 11 月左右，阳玛诺方才收到维埃拉和龙华民的指令，若辅理修士从内地抵达澳门且条件允许，他将和辅理修士通过广州交易会进入内地。[4]一年后，阳玛诺的返程计划得以实现。1619 年 11 月，阳玛诺与邬若望（João Uremano, 1583-1620）正进入内地，12 月抵达广州，次年初进一步北上。二人成为南京教案后首批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实现了耶稣会士两两一组通过交易会重返内地的计划。邬若望因身体状况不佳被迫留在南昌，最

1 董少新、刘耿，《〈1618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上），《国际汉学》2017 年第 4 期，第 142 页。

2 Sabatino de Ursis, Principiam as notícias do ano de 1613, fl. 143v. 关于是否派遣神父居住于墓园的争论，参见刘耿，《利玛窦墓园的前七年（1610-1616）》，《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111-120 页。

3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阳玛诺，《致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16.12.26, Macau, ARSI, JS, 17, fls. 39-40v.

4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Nuno Mascarenhas assistente da província de Portugal em Roma（阳玛诺，《致驻罗马的葡萄牙教省参赞马什卡雷尼亚什神父》）, 1618.11.14, Macau, ARSI, JS, 17, fl. 188.

终在南昌逝世。[1]阳玛诺则可能继续前往杭州，与居于杭州的中国传教区会长龙华民会面。

由于万历皇帝遣返传教士的圣旨，耶稣会士潜藏起来，不再公开活动。因此，重返内地、重新公开活动成为耶稣会士的迫切愿望。此时，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大败，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等人提出引进西洋大炮和兵学以挽救王朝危机，[2]借机帮助耶稣会士恢复活动。1619 至 1620 年间，徐光启和李之藻已多次上疏，提出澳门的耶稣会士应跟随招募的欧洲士兵一同进入内地，为士兵提供精神指导，且耶稣会士的书籍能满足战事所需，可寻找尚在内地的耶稣会士。[3]

1621 年初，阳玛诺抵达北京，担任住院长，当时北京有毕方济（Francisco Sambiasi, 1582-1649）、辅理修士丘良厚（Mendes Pascol, 1584-1640）两名耶稣会士。[4]该年四月十九日，李之藻上《制胜务须西铳疏》，提出购买、仿制西洋大炮，招募夷目学习操作之术，招徕阳玛诺、毕方济等耶稣会士。五月初一日兵部尚书崔景荣上疏，五月初九日徐光启上《台铳事宜疏》，皆明确指出访求阳玛诺、毕方济，邀其携书讲解炮铳使用与制作之法。[5]可见，阳玛诺进京后，李之藻首先提出邀在京之阳、毕二人携兵书以助战事，为耶稣会士公开活动寻求合

1 Alfonso Vagnone, Carta ao padre Nuno Mascarenhas assistente pelas províncias de Portugal e das Índias (王丰肃，《致葡萄牙及印度教省参赞马什卡雷尼亚什神父》), 1619.11.10, Macau, ARSI, JS, 161-I, fl. 42v; Francisco Furtado, Ânua da China do ano de 1620 (傅汎际，《1620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 1621.8.24, Hangzhou, ARSI, JS, 114, fls. 241v-242.

2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5-91，225-269 页。崇祯年间募兵之事参见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65-86 页。

3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阳玛诺，《致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22.7.20, Beijing, ARSI, JS, 161-Ⅱ, fl. 63; Francisco Furtado, Ânua da China e de Cochinchina de 1619 (傅汎际，《1619 年耶稣会中国与交趾支那年信》),1620.11.1, Macau, ARSI, JS, 121, fls. 119v-120.

4 刘耿、董少新，《〈1621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海洋史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413-415 页。

5 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疏》，《李之藻集》，第 24-29 页；方豪，《李之藻研究》(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第 243-244 页。

法性。

李之藻等人上疏获批后，立即商议派遣教徒寻访耶稣会士，但因时机未到，教徒未立即出发，阳玛诺则将情况告知居于杭州的龙华民，请其为教徒的抵达做好准备。[1]后来，阳玛诺再次致信杭州的耶稣会士，坚持派遣传教士前往北京。[2]显然，阳玛诺决定抓住这次机会，争取在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帮助下恢复传教活动。

就在耶稣会士与信教、友教士人为传教士在京城重新露面做准备时，七月沈潅抵京入阁办事。[3]借辅助战事之名招徕耶稣会士的计划被迫立即中断，阳玛诺随即藏匿于京师周边，毕方济则前往杭州。耶稣会士认为，沈潅在北京时，“京师只要一名神父、一名修士足矣”。[4]毕方济离京后，在近一年时间内，北京仅阳玛诺一名神父。1622 年初，阳玛诺伺机进入北京城，居于教徒家中，以便照管城中教徒。其同伴中国修士丘良厚则公开活动，同友教官员打交道，在合适之时将教徒带去阳玛诺处听弥撒和告解。[5]

沈潅入京后，屡遭弹劾，使耶稣会士看到了希望。首辅叶向高（1559-1627）亦为传教士重返北京做出了努力。他曾告诉丘良厚，他已与沈潅多次谈论从澳门募兵的重要性，尽管沈潅反对，他仍将与兵部商议。叶向高还建议龙华民前往北京，不必惧怕沈潅的存在。1622 年 6 月左右，龙华民卸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职务，决定前往北京。[6]

---

1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22.7.20, fl. 63.

2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3 (傅汎际，《1623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24.4.10, Hangzhou, BA, JA, 49-V-6, fl. 112v.

3 《明熹宗实录》卷 12，天启元年七月六日，第 591 页。

4 刘耿、董少新：《〈1621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第 413 页。

5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22.7.20, fl. 63v;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3, fl. 112.

6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22.7.20, fl. 63v; Manuel Dias Sénior, Carta ao padre Venceslau Pantaleão (李玛诺，《致文塞斯劳神父》), 1622.6.10/20, Macau, ARSI,

阳玛诺一边观察沈潅的去留，一边等待龙华民的抵达。阳玛诺和友教人士皆认为，沈潅还在北京时，耶稣会士不宜公开露面，“最好多一点耐心，不要冒风险行事”。[1]或许在南京教案的阴影下，阳玛诺担心沈潅会对传教事业再次造成破坏，故在恢复公开活动一事上强调保持谨慎和耐心。天启二年七月，沈潅上疏请告，致仕归乡。[2]

因明与后金战争和山东地区起义频发导致局势不稳、路途危险，龙华民等人推迟了旅途。1622 年 12 月 5 日，龙华民和汤若望（Adam Schall, 1591-1666）踏上进京之路。龙、汤二人出发后不久，杭州住院又收到北京来信，催促神父立即前往。龙华民和汤若望最终于 1623 年 1 月 25 日进入京城。[3]

1623 年 2 月 25 日，阳玛诺和龙华民身着文人服饰，手握派其前往京师的任命文件，出现在兵部。兵部官员接待了耶稣会士，并询问他们是否有澳门的炮手前来以及神父们是否懂这门技术。耶稣会士回答有炮手前来，但表明他们不懂炮铳之术，但可规劝炮手温顺行事。[4]正如龙华民进京前就同其他耶稣会士所商议的那样，要清楚说明神父不懂军事，只知文字和宗教。[5]总之，在为战争服务的名义下，耶稣会士公开出现于京师。26 日，阳玛诺和龙华民再度前往兵部，找到兵部尚书孙承宗（1563-1638），孙承宗礼待了二人。27 日，耶稣会士身着长袍前往宫殿叩谢皇帝。28 日，阳、龙拜访叶向高，感谢叶氏对耶稣会士的帮

JS, 161-Ⅰ, fl. 62; Niccolò Longobardo, Carta ao padre visitador Gabriel de Mattos (龙华民，《致巡阅使加布里埃尔·马托斯神父》), 1622.4.25, Hangzhou, BA, JA, 49-V-4, fls. 15v-16. 关于叶向高与西学，参见陈拓，《在中国发现西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第 65-103 页。

1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22.7.20, fl. 64.

2 《明熹宗实录》卷 24，天启元年七月十九日，第 1212 页。

3 Manuel Dias Sénior, Copia de uma que o padre Manuel Dias Sénior escreveu ao padre Jerónimo Rodrigues visitador de Japão e China (李玛诺，《李玛诺神父写给日本—中国巡阅使骆入禄神父的一封信件的抄件》), 1623, Hangzhou, ARSI, JS, 161-II, fl. 79v.

4 Manuel Dias Sénior, Copia de uma que o padre Manuel Dias Sénior escreveu ao padre Jerónimo Rodrigues visitador de Japão e China, 1623, fl. 80.

5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3, fl. 112v.

助，并请其日后给予庇护。通过这四次外出，耶稣会士在京师愈加公开露面，开始拜访诸多官员，并着手向皇帝呈递奏疏。[1]

4 月 23 日，阳玛诺和龙华民将讲述耶稣会士抵京之事的奏疏呈给皇帝，随后皇帝批复礼部处理。耶稣会士以服务战争为名义顺利出现于京师，不过他们认为译书修历才是为自身争取活动合法性的最佳方案。因此，阳玛诺和龙华民重提译书修历计划，希望得到礼部的认可和帮助。不过，礼部官员认为时机未到，不宜向皇帝请示。耶稣会士对这一回复感到沮丧，但在友教士人的建议下不再坚持。[2]

1623 年夏，京师官员请耶稣会士推算 10 月 8 日的月食，称若耶稣会士计算无误，他们会立即向皇帝呈上翻译西洋历算书籍的奏疏。于是，邓玉函（Johann Schreck/Terrenz, 1576-1630）从杭州前往北京以提供帮助。在邓玉函到达之前，汤若望已完成了任务，而邓玉函的到来使计算更加精确。10 月 9 日，户部尚书和礼部侍郎前来祝贺耶稣会士，随后建议钦天监正上呈耶稣会士的奏疏。[3]为此，孙元化非常细致地撰写了奏疏。不过，奏疏最终未获批复。值得提及的是，有官员批评阳玛诺在过去几年中引发了诸多麻烦，应指阳玛诺推动招募葡兵及修历译书等事。[4]作为恢复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首要人物，阳玛诺在京师的一系列行动理应为北京官员所知晓。

尽管要等到 1629 年徐光启推动历局建立时译书修历计划才真正落实，但耶

1 Manuel Dias Sénior, Copia de uma que o padre Manuel Dias Sénior escreveu ao padre Jerónimo Rodrigues visitador de Japão e China, 1623, fl. 80.

2 Manuel Dias Sénior, Copia de uma que o padre Manuel Dias Sénior escreveu ao padre Jerónimo Rodrigues visitador de Japão e China, 1623, fl. 80v;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3, fls. 116-116v.

3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3, fl. 116v. 天启三年九月十五日即西历 10 月 8 日，“酉月食亥复圆”，《明熹宗实录》卷 38，天启三年九月十五日，第 1955 页。

4 Manuel Dias Sénior, Carta a certo jesuíta de Japão (李玛诺，《致日本某耶稣会士》), 1625.3.1, Hangzhou, BA, JA, 49-V-6, fl. 162v. 这封长信被抄录于傅汎际编《1624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中,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4, 1625.4.17, Hangzhou, BA, JA, 49-V-6 fls. 161v-176v.

稣会士从未放弃借助历算将天主教植入中国的策略。天启年间阳玛诺、龙华民试图重提译书修历以及汤若望、邓玉函受邀测算月食，皆为崇祯年间建立历局、编撰《崇祯历书》做出了铺垫。总之，在募兵铸炮和译书修历的名义下，耶稣会士在京公开活动，与官员频繁来往，逐渐将传教事业恢复至南京教案之前的状态。

二、在华中前期：耶稣会首任中国副省会长（1623-1635）

1622 年，罗儒望（João de Rocha, 1566-1623）由南昌前往杭州，接替龙华民成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1623 年 3 月，罗儒望在杭州去世。此时，从罗马发出的任命信抵达中国。耶稣会总会长下令，若龙华民去世，罗儒望和阳玛诺依次接替其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因罗儒望去世，阳玛诺成为首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1]阳氏在中国积累的丰富经验及其葡萄牙人身份[2]应是其被选为副省会长的主要原因。在 1623 至 1635 年任职期间，阳玛诺承担巡阅传教区、人员调遣、住院建设、向上级汇报教务等基本职责，同时面临人员缺乏和译名之争等诸多难题。

巡阅传教区是副省会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副省会长应在巡阅过程中了解各个住院的教务、财务情况，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定期向罗马总部汇报传教区情况等。由于阳玛诺十分重视北京的事务，故在担任副省会长后未立即离京。1624 年，阳玛诺生了一场重病，一位中国宫廷医生治好了他。[3]大约 1626 年初，阳玛诺离开北京。此后的十年间，为巡阅传教区和管理教务，阳玛诺未固定于某地传教，而是长期奔波于中国各地。

1627 年 2 月 20 日，阳玛诺在南昌致信耶稣会总会长，称其已完成上任后

1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3, fl. 106.

2 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事业受葡萄牙王室资助，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常担任高职。

3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4, fl. 179.

的第一次巡阅，并表示在辽阔的中国大地旅行十分“辛劳和疲惫”。[1]1623 年，耶稣会士拥有北京、嘉定、上海、杭州、南昌和建昌六所住院。[2]至 1626 年，耶稣会士已在北京、山西、陕西、南京、浙江、江西、福建七省建立起十所住院，[3]1628 年又在河南建立了住院。[4]传教点的扩大意味着耶稣会士已取得可观的传教成果，也意味着副省会长在巡阅和管理传教区方面承受更重的负担，巡阅整个传教区往往要花一年多的时间。

鉴于管理、巡阅传教区的工作劳累不堪，以及担任副省会长过久，阳玛诺于 1630 年请求总会长指派他人接任该职。[5]1633 年，阳玛诺仍期望收到罗马寄来的新任命书，好让他“从持续的水陆旅行中解脱出来”。阳玛诺还提出，应在时机合适时任命两名传教区会长，一名负责北方，一名负责南方，惟此时副省人手不足，不必立即划分。[6]十年后，因明清战争导致的局势动荡和通讯中断，耶稣会中国副省被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副省会长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 1587-1653）负责北方传教区，艾儒略则为南方的副省会长。[7]基于亲身经历以及对中国本土情况的了解，阳玛诺提出设立两名传教区会长的建议，而这一建议于数年

1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阳玛诺，《致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27.2.20, Nanchang, ARSI, JS, 161-Ⅱ, fl. 97.

2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3, fls. 105-131v.

3 Manuel Dias Sénior,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6 (李玛诺，《1626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ARSI, JS, 115, fls. 93-118v.

4 Rodrigo de Figueired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8 (费乐德，《1628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29.8.22, Hangzhou, ARSI, JS, 115, fls. 179-180.

5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阳玛诺，《致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30.4.20, Nanchang, ARSI, JS, 18-Ⅰ, fl. 93.

6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阳玛诺，《致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33.11.1, Nanchang, ARSI, JS, 18-Ⅰ, fl. 141.

7 刘耿、董少新：《〈1644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文化杂志》2017 年第 100 期，第 74 页。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9.

后在新情势下得到了实施。不过，自阳玛诺 1648 年二度担任副省会长后，耶稣会中国副省仍仅设一名副省会长。

传教点的扩张除带来巡阅和管理上的困难外，也使人员短缺问题更加突显。阳玛诺反复请求总会长向中国派遣人员，他也不得不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考虑住院建设与神父调度问题。1624 年，阳玛诺派遣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前往山西为韩霖、韩云两兄弟的家人施洗。同时，因母丧归家的王徵（1571-1644）致信阳玛诺，请求派遣神父为其家人付洗，阳玛诺亦派遣金尼阁前往陕西。[1]王徵中天启二年（1622）进士，是年六月除直隶广平推官，四年（1624）初夏因丁母忧返乡。[2]阳玛诺于 1621 年初抵达北京，1622 年京师仅阳氏一名耶稣会神父。王徵为参加会试进京后，随即前往利玛窦墓园同耶稣会士见面，通过王徵的关系，阳玛诺等人结识了一些重要的官员。[3]王徵停留北京期间，与阳玛诺有诸多来往，据称其在“做事之前首先与神父商议，在他受到任命打算离京之时，先至神父处斋戒三日，并准备好向神父告解以及领受圣事”。[4]可见王徵与阳玛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1628 年，居于山西绛州的教徒伯多禄（Pedro）力邀耶稣会士前往河南开教，耶稣会士就此请示阳玛诺。应在得到阳玛诺的批准后，毕方济前往开封建立住院。伯多禄住在开封的兄弟受洗入教，被耶稣会士称为开封教友群体“精神大厦的第一块基石”。[5]

1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4, fls. 168-168v.

2 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 38 页。

3 刘耿、董少新：《〈1621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第 415-416 页。

4 Álvaro Semedo, Carta ânua da missão da China do ano de 1622 (曾德昭，《1622 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年信》), 1623.6.23, Hangzhou, BA, JA, 49-V-7, fl. 367v.

5 Rodrigo de Figueired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8, fls. 179-180. 《1628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未写明前往河南开封的神父的名字，高龙鞏称该神父为毕方济，见高龙鞏（Augustinus M. Colombel）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 1 册（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第 254-255 页。教

在派遣耶稣会士外出的过程中，也有意外发生。1628 年，湖广通山县知县多次请求阳玛诺派遣一名神父前去听告解。该奉教知县是一名举人，姓潘（Puon），洗名为西满（Simão）。[1]是年末，阳玛诺派史惟贞（Pierre Van Spiere, 1584-1628）前往通山。史惟贞一行在途中遭遇船夫抢劫，被投入河中最终身亡。得知史惟贞迟迟未抵目的地，阳玛诺派人前往通山县探究原因，最终在知县的帮助下将罪犯绳之以法。[2]史惟贞去世五年后，费乐德（Rodrigo de Figueiredo, 1594-1642）进入湖广传教。阳玛诺曾期待费乐德在湖广建立新住院，但因湖广地区爆发骚乱，费乐德最终离开了湖广。阳玛诺仍十分重视湖广地区，计划安排神父常驻。[3]但直到 1638 年初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 1592-1677）抵达武昌后，耶稣会士才首次在湖广建立起住院。[4]

在修历一事上，阳玛诺虽未直接参与编纂《崇祯历书》，但对此次译书活动颇为费心。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奏请参考西历修正历法，礼部上奏请开历局，徐光启领旨督修。[5]初开历局时，仅有邓玉函参与工作，阳玛诺认为此非长远之计。在 1630 年 4 月 20 日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书信中，阳玛诺极力强调修历工作是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重要保障，必须继续下去，并请求总会长每年派遣一至两名擅长历算的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从而保证北京始终有一名历算家。他在

徒伯多禄的身份暂无法确定。

1 “Puon”或即潘，该知县可能为潘张。潘张，云南鹤庆人，举人，崇祯元年任通山县知县，见罗登瀛修，乐纯青纂：《通山县志》卷 4，清同治七年活字本，第 6a 页。

2 André Palmeiro, Itinerário do padre António Palmeiro visitador das províncias de Japão e China (班安德，《日本—中国巡阅使班安德神父巡阅记》)，1630.1.8, Macau, ARSI, JS, 161-II, fls. 122v-123; Rodrigo de Figueired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8, fls. 187v-190.

3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33.11.1, fl. 141v;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164 页。

4 董少新，《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 52-53 页。

5 徐光启，《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载李天纲编，《徐光启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 168 页。

信中写道：“这里没有人比邓玉函神父懂得更多了，现在他承担着一切，当他去世之时，就没有其他人了，因而始终需要有人接替他。”[1]

阳玛诺颇具洞察力，在他写下此信后不足一月，邓玉函突然因病逝世，修历工作一度中断。徐光启随即上疏请召汤若望和罗雅谷进京，以填补空缺。崇祯三年（1630）五月十九日，徐光启奉圣旨召汤若望和罗雅谷入京。[2]于是，罗、汤二人手持任命书，分别从各自所在地出发前往北京。[3]阳玛诺作为副省会长以及修历计划的支持者，应推动了罗、汤二人的赴京之行。1633 年，阳玛诺再次请求总会长派遣擅长历算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但始终未有新人加入。[4]

译书修历活动为耶稣会士在中国居住与传教赢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南京住院的恢复即体现了此点。1629 年 5 月，阳玛诺陪同耶稣会中国—日本巡阅使班安德（André Palmeiro, 1569-1635）巡阅至南京时，有三名教徒找到阳玛诺行告解，还有一名望道友渴望受洗。班安德令阳玛诺抵达杭州后立即派遣费乐德前往南京。此时，班安德已希望尽快恢复南京住院。[5]或因阳玛诺行事谨慎，判断耶稣会士在南京城中活动仍存风险，故推迟了派遣。1633 年，阳玛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着手安排一名耶稣会士常驻南京。[6]1633 年末，毕方济带着徐光启的公文进入南京，公文要求毕方济前往南京为修历进行天文测量，毕方济获得了南

1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30.4.20, fl. 93v.

2 徐光启，《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第 169-170 页；徐光启，《修改历法远臣罗雅谷到京疏》，《徐光启诗文集》，第 171 页。

3 Lazzaro Cattane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30 (郭居静，《1630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31.9.12, JA, 49-V-8, fl. 713v.

4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33.11.1, fl. 141.

5 André Palmeiro, Itinerário do padre António Palmeiro visitador das províncias de Japão e China, fls. 124-124v.

6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33.11.1, fl. 141v.

京官员的友好对待，此为南京教案爆发后耶稣会士首次公开进入南京。[1]可想而知，测量活动背后的真实意图即恢复南京住院，毕方济此行应由徐光启、阳玛诺二人促成。

除巡阅劳累、人员短缺等问题外，译名之争是阳玛诺首次担任副省会长期间面临的一大难题。学界关于译名之争的研究已很深入，本文重点讨论阳玛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 1627 年 2 月 20 日写给总会长的书信中，阳玛诺写道，在华耶稣会士因译名争论分成了两派，一派反对布道和书籍中采用“上帝”等中文译名，另一派则相反，[2]双方为自身立场辩护而撰写了数份文件，但未达成共识。这种意见不统一几乎造成了在华耶稣会士的分裂，并对传教活动造成了阻碍。更为严重的是，译名之争对一些耶稣会士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焦虑不安，不知如何布道。[3]面对这一危机状态，阳玛诺决定立即举行一次全体商讨会，并力请时在澳门的日本—中国巡阅使班安德参与，希望由班安德为译名问题做出判断和决定。[4]阳玛诺未在信中陈述他对译名问题的看法，或许是副省会长的身份使其尽力保持中立立场，故没有为任何一方辩护，而是尽可能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可能因阳玛诺感到自身无法做出决定，且在诸多事务上须听命于巡阅使班安德，故请求班安德参与商讨。阳玛诺所说的“全体商讨”即 1627 年底举行的嘉定会议，可见嘉定会议的召开是阳玛诺决定和促成的。

班安德以自己不懂中文为由拒绝出席，但同意在嘉定召开会议。[5]1627 年 12

1 João Froes,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34 (伏若望，《1634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34.9.8, Hangzhou, ARSI, JS, 115, fl. 273; 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p. 240.

2 反对派以龙华民为代表，支持派则有高一志、金尼阁等。

3 1628 年，金尼阁因未能维护“上帝”一词而抑郁自杀，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p. 87. 可能在嘉定会议召开之前，金尼阁的精神状态已被译名争论所影响。

4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27.2.20, fls. 97-97v.

5 Liam Matthew Brockey, *The Visitor: Andre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19.

月至 1628 年 1 月，嘉定会议召开，由阳玛诺主持。[1]据《1627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记载，该年末杨廷筠（1562-1627）在杭州去世时，阳玛诺正在嘉定，阳氏令所有住院为杨廷筠做弥撒和纪念，数日后阳氏方才前往杭州并召集其他神父再行圣事和布道，可知当时阳玛诺应忙于商讨而无法立即离开嘉定。[2]经过一月讨论后，大多数耶稣会士支持采用“天主”术语，同意“上帝”也可被用于指称“Deus”，但需要在相当谨慎和充分解释的情况下使用。[3]

据多明我会士闵明我（Fernández de Navarrete, 1610-1689）记载，耶稣会士在嘉定会议上讨论了三十六项关于崇拜、迷信和偶像崇拜的议题。[4]多明我会士施若翰（Juan García de León, 1606-1665）在其写于 1648 年 9 月 27 日的书信中称，阳玛诺做出了赞成这些仪式的裁决，理由是“以免给异教徒提供发起更多迫害的理由”。[5]由此可见，阳玛诺历经南京教案并为恢复耶稣会士活动付出巨大心血，十分重视传教区的安全和稳定，不希望因礼仪争端引发新的教案，故宣布了继续采用“上帝”译名的决定。但如学者指出，龙华民手稿《关于上帝、天神、灵魂等中文译名争议的简短回应》应完成于嘉定会议之后，其中龙氏极力反对“上

1 Paul A.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 Allen & Unwin, 1986), p. 86.

2 Manuel Dias Sénior,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27 (李玛诺，《1627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28.5.9, Shanghai, ARSI, JS, 115, fls. 143v-144. 关于杨廷筠，参见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著，圣神研究中心译，《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Paul A.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p. 87; Claudia von Collani, "The Genesis, Edi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Longobardo's Treatise," in Thierry Meynard and Daniel Canaris eds., *A Brief Response o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Shangdi*, *Tianshen and Linghun*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 14.

4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Controversias Antiguas y Modernas entre los Missionarios de la Gran China* (Madrid, 1679), pp. 109-137.

5 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Ⅰ (1632-1700)* (Madrid: Imprenta Juan Bravo, 1964), p. 113.

帝"等中文译名。[1]这表明龙华民对嘉定会议的商讨结果并不满意，也意味着译名之争还将继续。

嘉定会议后，阳玛诺可能及时向班安德汇报了会议情况，尤其是龙华民的反对意见，并再次请求班安德前往内地。1628 年 12 月 11 日，班安德跟随葡兵队伍从澳门出发，五天后抵达广州。停留广州期间，一名教徒告诉班安德，阳玛诺通过信使得知他已进入内地，正在南昌等其到来。1629 年 2 月 28 日，班安德出发北上，4 月 7 日抵达南昌，找到阳玛诺和丘良厚。4 月 21 日，阳玛诺陪同班安德离开南昌，经水路前往南京，13 天后抵达，随后前往镇江。在镇江，班安德与阳玛兵分两路。班安德继续北上，以巡阅北京住院。阳玛诺则在班氏派遣下前往杭州，以就某些重要事项同其他耶稣会士商议，并将相关意见告知班安德。巡阅北京、嘉定、上海三处住院后，班安德于 8 月抵达杭州，与阳玛诺等人检查了以往的传教区规定之后下达了新的规定。8 月 18 日，班安德启程返澳。[2]可见，在班安德巡阅内地的过程中，阳玛诺应与班安德就传教区情况有过密切交流，班安德通过阳玛诺获取了有关中国副省的诸多信息，并在解决问题与制定规章的过程中听取了阳玛诺的意见。

在译名问题上，班安德禁止使用中文术语"上帝"、"天"，批准用"天主"指代"Deus"，同时命令传教士继续使用中文布道著书，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使用音译词汇。[3]班安德的命令随即遭到高一志的激烈抗议。高一志在致总会长的信中，指责班安德只听取反对者的意见便要求全体耶稣会士服从其命令，称这样的做法不能带来统一而只会适得其反，惟有通过如嘉定会议那样的商讨方式才能解

1 Song Lim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Non-Christian Literati and Reflections on the Dating of the 'Resposta breve' and Its Place of Composition," in *A Brief Response o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Shangdi, Tianshen and Linghun*, pp. 39-41.

2 André Palmeiro, Itinerário do padre António Palmeiro visitador das províncias de Japão e China, fls. 118v-133.

3 Liam Matthew Brockey, *The Visitor: Andre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pp. 275, 312-313.

决争议。[1]在写给班安德的书信中，高一志的语气似乎更加激烈，他指责班安德偏袒反对“上帝”译名者，甚至请求总会长谴责班氏。班安德则对高一志的冒犯与不服从感到愤怒，对高一志严加斥责，并考虑将其召回澳门冷静，班安德称阳玛诺和其他年长传教士也敦促他这样做。[2]由此推知，阳玛诺应同样认为高一志反应过于激烈，不利于耶稣会士的内部团结和传教区的稳定。事实上，班安德面对的不仅是为“上帝”激烈辩护的高一志，还有极力反对中文译名的龙华民，故其用“天主”指称“Deus”已是调和争端的折中选择。

在班安德处理译名问题的过程中，阳玛诺似与班安德保持一致立场。[3]他支持班安德的立场亦不难理解。面对译名争端，阳玛诺多次请求班安德巡阅内地并做出裁决。班安德进入内地后，阳氏不仅迎接并陪同班安德巡阅，还在传教区事务上为班安德提供了诸多信息和建议。班安德禁用中文术语“上帝”、“天”的命令极有可能是在同阳玛诺商议后做出的。

班安德下达命令时，阳玛诺已在中国传教区活动近二十年。作为一名历经南京教案且在京师居住多年的耶稣会士，阳玛诺十分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1631 年，龙华民起草了一份奏疏，计划将奏疏与礼物一同呈给皇帝。在奏疏中，龙华民采用“Deus”的音译，而非“上帝”一词，其他神学术语皆使用音译。当时阳玛诺正在北京，阻止了这份奏疏的送出。[4]阳氏可能已预见到，这份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奏疏会给耶稣会士造成不利。

阳玛诺一面急需平息耶稣会士内部争端，一面必须避免天主教同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冲突；他既意识到“上帝”一词的争议性，又明白术语本土化对于传教的

1 Alfonso Vagnoni,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29.12.18, fls. 107-107v.

2 Liam Matthew Brockey, *The Visitor: Andre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pp. 314-315.

3 鲁保禄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的一封书信指出，“阳玛诺似乎站在班安德一边”，该书信编号为 ARSI, FG, 730, 8.5，见 Paul A.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p. 264, n. 87. 笔者目前暂未收集到阳玛诺对译名问题看法的直接证据。

4 Liam Matthew Brockey, *The Visitor: Andre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p. 316.

必要性。因此，这种矛盾心理或导致阳玛诺感到自身难就译名争论做出决定而请班安德裁决，这也应是阳玛诺赞同班安德折中方案的原因之一。

同时，作为中国副省会长，阳玛诺首要关心的是传教区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当译名争端已对传教造成阻碍时，阳玛诺召集传教士进行集体商讨。嘉定会议上同意使用“上帝”一词的决定，与班安德禁止“上帝”译名的命令，这两次相反的决定或许暗示阳玛诺相对中立的立场。比起判定“上帝”的对或错，阳玛诺更希望尽早结束争端。1634 年，阳玛诺向耶稣会总会长表明，耶稣会士对班安德的命令及其毁掉龙华民手稿等消除争议的措施感到满意。阳氏对达成的新共识充满乐观，宣称这场争论似乎已经彻底解决，“永远不会，或只在很长时间后，才会被再次提起”。[1]但事实上，托钵修士进入中国后，引发了礼仪之争，阳玛诺、班安德平息译名争议的举措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伴眼中，阳玛诺谨慎、耐心，“如此温和亲切地下达命令，以至于下属们乐意执行他的指令”；同时，阳氏“极其严格地遵守规则，话语很少，即使是在恰当时分说的话，也非常有分量和分寸”。[2]大概谨慎少言、温和服从的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阳玛诺的折中态度。

无论如何，在 1623 至 1635 年间，耶稣会中国副省经历了教案后的恢复与扩张，耶稣会士开辟了山西、陕西、河南等新传教点，恢复了南京住院，亦在徐光启等人的帮助下实现了修历计划，耶稣会士得以更安全地在北京和其余各省公开活动。阳玛诺通过人员调遣、住院建设以及与王徵、徐光启、杨廷筠等人的交往，在耶稣会士与中国地方社会的互动以及《崇祯历书》的编撰上起到了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推动作用。为维护会内团结与传教区稳定，阳玛诺通过召开嘉定会议以结束传教士在译名问题上的分裂状态。在班安德禁令下，耶稣会士达成了表

1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34, fl. 21v, 转引自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p. 89.

2 Feliciano Pachec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60 (成际理，《1660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61.7.19, BA, JA, 49-V-14, fl. 718.

面的一致。阳玛诺首次担任中国副省会长的十二年间，正是耶稣会中国传教区较为平稳发展的阶段，在此过程中阳玛诺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

三、在华中后期：从福建教案到明清战乱（1635-1648）

1635 年，阳玛诺卸任副省会长，至 1648 年再度担任副省会长期间，阳氏主要活动于南京、福建、浙江、江西等地，专注于传教与著书。

1636 年，阳玛诺与毕方济居于南京住院，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传教。[1]1637 至 1638 年，阳氏于闽传教，任福州住院长，恰遇福建教案。1630 年代，托钵修士打破耶稣会中国传教垄断权进入福建地区。托钵修士禁止天主教徒祭祖祀孔的行为和较为激进的传教方式，引起了福建官府的注意。官府先以通夷之罪逮捕通夷之犯和夷人，经查明夷人为天主教传教士，判定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并危害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后，随即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并驱逐省内所有传教士。托钵修士陆续被捕并被驱逐出境，耶稣会福建教会转入地下，事件最终演变为波及全省的“教难”，即 1637-1638 年的福建教案。[2]

早在阳玛诺担任副省会长期间，其得知托钵修士进入中国后，便在 1633 年 11 月 1 日致总会长的书信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恳求总会长采取措施，阻止托钵修士入华。[3]或令阳玛诺未预料的是，此年圣诞节前，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 1602-1669）便来到他所在的南昌住院。利

1 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edição,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 de Araújo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Oriente &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 1998), p. 67.

2 关于福建教案，参见 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Ⅰ (1632–1700), pp. 127-166; Eugenio Menegon, “Jesuits, Franciscans and Dominicans in Fujian: The Anti-Christian Incidents of 1637-38,” in Tiziana Lippiello and Roman Ma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Sankt Augustin &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7), pp. 219-262; 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 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 72-83 页。

3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33.11.1, fl. 141v.

安当或为发展新传教地，或为学习语言而离开福建。也许他初来乍到且不通汉语，希望得到耶稣会士的合作与帮助，因此在教徒的引导下找到阳玛诺。阳玛诺接待了利安当，但不愿利安当继续留在南昌住院，故答应利安当的请求，派人陪其前往南京。[1]

利安当于 1634 年初抵达南京，自述其在南京遭到耶稣会士的恶劣对待，被阳玛诺和毕方济的仆人捆绑起来强行押上船只，送回托钵修士所在的福安，而这场“绑架案”正是阳玛诺谋划的。[2]对此，傅汎际解释道，南京教案仍记忆犹新，由于担心利安当的到来引发新的迫害，故耶稣会士决定让利安当返回福安。[3]对于阳玛诺来说，打发利安当离开南昌并同意其前往南京应为权宜之计。可能在与毕方济商议后，阳玛诺认为从南京将利安当送回福建应是最合适的做法。或因利安当不愿离开南京，耶稣会士便采取了强硬手段。数年后，利安当称阳玛诺在一封信中就“绑架案”请求其原谅。[4]

在排斥托钵修士的同时，阳玛诺或出于同情，或出于维护传教区稳定、避免滋生事端的目的，也为托钵修士提供了帮助。1637 年 6 月，方济各会士玛方济（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1657）和雅连达（Gaspar de Alenda，？-1642）在罗文炤（Gregorio López, 1617-1691）等中国教徒的陪同下前往北京。抵达北京后，玛方济等人被汤若望安置在利玛窦墓园内，随后中国官员将托钵修士逮捕并押回福建。[5]玛方济和雅连达被押回福建后，时任福州住院长阳玛诺前去探视，

1 P. 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ed.,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Quaracchi-Firenze: Apud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1933), pp. 318-319; Matos de Bento,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林本笃,《致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34.2.20, Fujian, ARSI, JS, 161-Ⅱ, fl. 148;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傅汎际，《致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36.11.10, ARSI, JS, 161-Ⅱ, fl. 164.

2 P. 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ed.,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pp. 319-320.

3 Francisco Furtado, Carta ao pa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al da companhia de Jesus, 1636.11.10, fl. 164.

4 P. 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ed.,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p. 413.

5 Eugenio Menegon, “Jesuits, Franciscans and Dominicans in Fujian,” pp. 234-242.

劝说其逃回福安，并为其提供船和水手。在阳氏的帮助下，二人回到顶头。[1]托钵修士在被驱逐至澳门的途中，亦在福州和泉州分别受到阳玛诺和艾儒略的友待。[2]

同为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士自然也被卷入教案之中。托钵修士被捕后，福州知府吴起龙派人前往福州住院质问阳玛诺。为此，阳玛诺准备了一些天主教书籍。在教徒的陪同下前往府衙，希望向知府讲明天主教义，但遭到吴起龙的拒绝。与教徒商量后，阳玛诺决定到艾儒略所在的泉州避避风头，希望通过友教官员的庇护平息风波。于是，阳玛诺将照管教友一事交由三名传道员，并把住院和教堂托付给一位重要的教徒。[3]

阳玛诺尚未至泉州，即在兴化与从泉州赶来的艾儒略相遇，二人避居于该城教徒购买的新住所和新教堂中，不久便收到消息，福州官员再次颁布禁教告示，且在告示中点名阳玛诺和艾儒略。[4]阳玛诺和艾儒略讨论应对方案后，艾氏返回泉州，而阳氏则继续留在兴化，照管兴化教友。[5]

1638 年 7 月 11 日，杭州住院院长伏若望（Fróis João, 1591-1638）因病去世，阳玛诺受命从福建前往浙江，填补伏若望的空缺，任杭州住院长。在前往浙江途中，阳氏路过福州，履行了先前离开时向教徒许下的承诺："阳玛诺神父秘密地为教徒们做圣事、安慰和鼓励他们，并为一些人施洗"。[6]最终，通过艾儒略在福建积累的人脉，耶稣会士获得友教官员的庇护，渡过了此次教案危机。抵达杭州不久，阳玛诺便前往宁波传教：

---

1 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Ⅰ (1632-1700)*, p. 132.

2 João Monteir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e 1638 (孟儒望，《1638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39.9.20, ARSI, JS, 121,fl. 183v.

3 João Monteir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e 1638, fls. 183v-184.

4 徐世荫，《提刑按察司告示》，《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下册），第 1752-1754 页；吴起龙，《福州府告示》，《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下册），第 1754-1755 页。

5 João Monteir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e 1638, fls. 184-186.

6 João Monteir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e 1638, fls. 177, 185v-186.

“这年（引者按：即 1639 年）初，宁波的教徒写信给杭州的神父们，请求神父前往宁波，为那里一些渴望受洗的人施洗。阳玛诺神父不顾此时正值隆冬时节，他又年老体衰，因此不得不忍受了许多痛苦。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一路上充满着不便，尤其是在从一条河行至另一条河的途中上下颠簸。神父渡过了这些艰难，抵达了宁波府，那里为数不多的教徒以仁爱之心接待了神父。在短短六天多的时间里，神父为 14 人施洗，其中有一些秀才。”[1]

在经由阳玛诺施洗的人当中，有一名十六岁的学生，洗名玛第亚（Mathias），十分虔诚，其家人接待了阳玛诺。[2]据高龙鞏（Augustinus M. Colombel, 1833-1905）《江南传教史》，在宁波的入教人士中，有朱姓三兄弟伯多禄、葛思默、玛第亚，葛思默和玛第亚协助神父传教，颇有贡献。[3]据此，年信所说之玛第亚可能为中国天主教徒朱宗元即葛思默之弟。朱宗元，浙江鄞县人，1638 年由耶稣会士利类思（Lodovico Buglio, 1606-1682）施洗，洗名葛思默（Cosme）。[4]朱宗元曾为阳玛诺润色其书《轻世金书》，[5]并为阳玛诺《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作序，该序完成时间不清。序中朱宗元写道：

“阳公玛诺号演西，春秋七十有奇。始总教于中区，继传音于八闽。近承长令，来传浙境，训接之暇，勒成此书。其为书也，援据经言，博采先议，

1 João Monteir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e 1639 (孟儒望，《1639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40.10.8, ARSI, JS, 121, fls. 284-284v.

2 João Monteir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e 1639, fl. 284v.

3 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 1 册，第 234-235 页。高氏书中记为“周”姓，然应为“朱”。

4 João Monteiro,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e 1638, fl. 177. 关于朱宗元，参见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著，张旭鹏译，《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5 《轻世金书》在阳氏生前未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抄本，编号为 Chinois 7133。

绪引缕陈，纲厥条析，善恶之辨，较若列眉，报应之理，不爽毫末，洵淑慝之权衡，大道之指归矣。时公驻会城，去我海上，江山限隔，五百而遥，闵予小子，先以示我。呜呼！皇矣哉！上主之爱我也。大矣哉！吾师之怜予也。小子私幸，受业终岁，将振群聋，付之枣剞，稽首拜手，复我神师。"[1]

所引序言指出阳玛诺最初管理传教区，随后在福建活动，最近奉命传教浙江，并前往朱宗元家乡宁波传教，在此期间阳氏完成了《天主圣教十诫直诠》。由序中所述阳氏经历可推知，此书及朱宗元序应作于阳玛诺任杭州住院长之时（1638-1643 年）。在此期间，朱宗元应与阳玛诺交往密切。

1643 年，阳玛诺生了一场重病，甚至已涂抹了临终圣油，然"我主特别眷顾他，延长了他的生命，使其能为传教区做更多工作，为灵魂带来更多福祉，在副省会长神父的命令下，阳玛诺神父前往江西省城管理南昌住院"。[2]

1644 年，阳玛诺与费奇规、谢贵禄（Tranquillo Grassetti, 1588-1644）、辅理修士陆有机（Manuel Gomes, 1608-1647/1653）居住于南昌住院。因明清战争造成的混乱，年老多病的阳玛诺和费奇规离开南昌城，住进一个村子的教友家中，待两个月后骚乱稍作平息，两位神父返回南昌。[3]

1645 年 5 月，耶稣会士获悉清军逼近南昌，中国副省南部会长艾儒略与阳玛诺、谢贵禄商量后，决定谢贵禄和陆有机继续留在南昌，艾儒略和阳玛诺则沿江上行至建昌县。随后，尽管冒着战争的危险，"阳玛诺神父仍不顾一切翻越了福建的山岭，前往建宁县，救助那里的教友们"，因建宁县毗邻清军控制的江西，县中百姓纷纷逃难，是年 15 人领洗。[4]

1646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管理延平

1 阳玛诺，《天主圣教十诫直诠》（江宁天主堂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Chinois 7192，第 4b-5a 页。

2 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 143.

3 刘耿、董少新，《〈1644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第 85-86 页。

4 董少新，《〈1645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南部年信〉译注并序》，待刊稿。

住院，同居此地的还有穆尼阁（Smogulecki, 1610-1656）和辅理修士范有行（Pascoal Fernandes, 1609-1681）。当卫匡国前往其他住院时，阳玛诺则同范有行留于延平住院，此年阳氏应奔波于建宁、延平两地。[1]

1647 年，阳玛诺前往延平担任延平住院长，范有行和一名中国学生嘉禄（Carlos）与之同住。在清军攻入延平期间，阳玛诺谨慎地躲藏起来，保存教堂及其物品。尽管阳氏已十分年迈，但仍竭尽所能牧养教徒。由于战乱和物资匮乏，耶稣会士缺衣少粮，阳玛诺和艾儒略便将自己的衣物和被褥分给建宁住院的耶稣会士，以共渡难关。[2]

在 1635 年卸任副省会长后，阳玛诺有更多时间编撰天主教书籍，加之明清战争导致传教活动受阻，阳氏可将精力用于翻译和写作。《1645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南部年信》记载道：

> “神父不辞劳苦地编撰书籍，将它们翻译成中文，这对神父而言并不难，但也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没有任何空闲时间，笔耕不辍。他有一个中国学生，教名嘉禄，久经考验，能够经受住磨难，仍拥有美德与纯洁。他接待访客，照顾初学教理者，尽心尽责，赢得赞许。他心灵手巧，打理住院，减轻神父很多负担，让神父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书籍写作。”[3]

《1647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南部年信》亦载：“阳玛诺神父主要且非常有益的工作是用汉字翻译和编著书籍，神父极其精通汉文，这对传教区和中国人都有好处”。[4]即使在战乱期间，阳玛诺与艾儒略也继续翻译天主教书籍，“他们二人极其

1 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 328.

2 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p. 338, 403.

3 董少新：《〈1645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南部年信〉译注并序》，待刊稿。

4 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p. 338-339.

精通中文，他们的书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优雅和令人愉悦"。[1]

四、在华后期：再任副省会长与杭州晚年（1648-1659）

阳玛诺担任延平住院院长至 1648 年 9 月，此时阳氏再度受命担任副省会长并前往杭州。[2]何大化给予了阳玛诺非常高的评价："在华传教人员与去年年信所述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副省管理上有所变动，阳玛诺神父担任副省会长。阳玛诺神父曾担任过 13 年副省会长，他丰富的经验可以弥补其已届高龄和传教区物资匮乏的问题。"[3]阳玛诺首次任职时积累的丰富经验及其在中国长期传教的资历，使其得到上级肯定并再次被任命为副省会长。

尽管阳玛诺经验丰富，但也已 74 岁高龄，身体状态不佳。阳氏刚上任，便遇上棘手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控告汤若望案。安文思针对汤若望任钦天监正及生活品德等诸方面发起攻击，此事在耶稣会内部掀起巨大风波，直至汤若望去世才完全平息。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的相关信件、报告累积两大卷宗。[4]耶稣会档案中藏有一封阳玛诺于 1650 年 6 月 16 日写给潘国光（Francisco Brancati, 1607-1671）的书信，乃回复后者对汤若望事件的询问，可从中略窥阳氏态度。首先，针对北京发生之事，阳玛诺表示自己未收到所谓关于汤若望行为四十条的文件，但他会寄给潘国光两份发自安文思的文件以及傅汎际的十条论点[5]以供潘国光和其他神父阅读。有一封安文思的书信阳玛诺没有寄出，因为阳氏认为安文思在信中对汤若望行为的诸多解释可能只是想象；其次，

1 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p. 403-404.

2 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 402. 阳玛诺此次任期为 1648-1654 年。

3 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 386.

4 此事参见魏特（Alfons Väth）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 2 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第 93-107 页；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pp. 325-339.

5 该文件列举了汤若望应当辞去钦天监监正的十点理由，由傅汎际签署，据称是阳玛诺和其他九名耶稣会士的观点，邓恩认为此信为安文思本人所作，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p. 334.

阳玛诺等人计划派卫匡国前往北京协助汤若望在钦天监的工作；最后，阳玛诺叮嘱潘国光不要让辅理修士知晓北京发生的事情，阳氏在杭州住院也是这样做的，但他无奈地表示，“住院内外的所有人比我还知道得多”。[1]由此可知，阳玛诺并不完全相信安文思对汤若望的指控，而阳氏作为副省会长，有责任维护在华耶稣会的声誉，将此事控制在仅会内神父知晓的范围。1653 年，阳玛诺派遣潘国光巡阅北方传教区，并对汤若望一事进行调查，潘国光断定相关传言皆为谎言与谣传。[2]尽管相关争议仍在持续，但年老多病的阳玛诺已难有精力应付。

阳玛诺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在管理教会和照管教徒上已力不从心。1651 或 1652 年左右，阳氏已双目失明。[3]1652 年，张玛诺（Manuel Jorge, 1621-1677）陪同阳玛诺居于杭州住院。1653 年 7 月，张玛诺在阳氏许可下前往上海住院以聆听关于中文书籍的解释，与此同时成际理（Feliciano Pacheco, 1622-1687）前往杭州接替张玛诺。12 月，成际理因病返回上海住院治病，阳氏又将汪儒望（João Valat, 1614-1696）召至杭州住院。1654 年 12 月初，汪儒望奉曾德昭之命前往北京，张玛诺受命再次回到杭州住院。[4]由此可知，阳氏已难以独自管理住院，且身边需要其他耶稣会士照应。1655 年，杭州教会和教徒事务已交由张玛诺管理，“因为住院长阳玛诺神父失明数年，年老体衰，在举行弥撒时甚至无法跪下以敬拜圣体”。[5]

---

1 Manuel Dias Júnior, Carta ao padre Francisco Brancati (阳玛诺，《致潘国光神父》), 1650.6.16, Hangzhou, ARSI, JS, 142, fls. 122-122v. 此信书写十分潦草，辨认起来颇有难度，或因阳氏视力下降之故，见下文。

2 魏特，《汤若望传》第 2 册，第 104 页。潘国光是汤若望的坚定维护者。

3 潘国光向双目失明的阳玛诺宣读了龙华民作于 1651 年 8 月 17 日的书信，见魏特，《汤若望传》第 2 册，第 102 页。阳玛诺讣告亦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里，因双目失明不耐烦的时刻多了些”，Feliciano Pachec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60, fl. 718.

4 Manuel Jorge,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s anos de 1652,1653,1654 (张玛诺，《1652、1653、1654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55.5.7, Hangzhou, BA, JA, 49-Ⅳ-61, fl. 600.

5 Manuel Jorge,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s anos de 1652,1653,1654, fl. 600.

1659 年 3 月 1 日，[1]耄耋之年的阳玛诺离开人世，葬于杭州方井南。[2]通过方豪对杭州大方井墓地碑文的抄录，一则简短的阳玛诺墓志得以留存：“阳演西先生，译玛诺，圣名玛努阨尔（低亚斯）玻耳杜嘉尔国人，于万历庚戌年入中国，于顺治己亥年〇月〇日卒，享年〇十〇岁。”〇处乃刻碑时因不详而留下的空白。[3]此则墓志虽简，却是阳玛诺在华活动的重要证明。

耶稣会史料则尤为详尽，可补墓志空缺处。《1660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附录之《1659 年杭州住院》载有阳玛诺讣告，简述了阳氏生平、事迹与葬礼，实为最早的阳玛诺小传。[4]该文献对于阳玛诺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将其全文翻译于此：

> “1659 年 3 月 1 日，阳玛诺神父逝世，84 岁高龄，在会 67 年，于中国传教 40 多年，期间几乎总在负责管理传教区，曾担任巡阅使一职，后两次担任副省会长长达 18 年，不仅受到下属爱戴，也深获上级满意。我们深切怀念的尊敬的维特里斯奇神父曾特地写信感谢阳玛诺神父的忠诚与认真，在这些年中以珍贵而伟大的才干，管理着修会的中国传教区。
>
> 进入传教区后，阳玛诺神父付出巨大的勤劳与细心，投入到辛苦而乏味的中文学习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写作了多本书籍。不仅我们的人感到非常满意，中国人也十分尊敬他，他们惊讶于看到一个外国人在上了年纪之时开始学习他们的文字和特别的写作方式，且在短短几年中，可以达到他们从小就努力学习、付出辛劳艰难才能达到的水平。由于传教区贫困，这些书籍中的大部分无法印刷。付梓的有：十四卷福音书，包括全年的主日以及主基

1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修会历史，以时间为顺序的死者名》记阳玛诺逝世日期为 1659 年 3 月 4 日，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 185 页。本文据阳氏讣告采 3 月 1 日之说。

2 韩霖、张赓述，《圣教信证》，第 46 页。

3 方豪，《杭州大方井天主教古墓之沿革》，载《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自印本，1969），第 1944 页。

4 Feliciano Pachec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60, fls. 717v-719.

督、圣母、使徒和其他圣徒的节日；[1]对十诫的详细解释；[2]对在中国发现的一块石头碑文的精致解释，从使徒圣多默时代到日本使徒圣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 1506-1522）时代，其中对我们的圣律做了清晰而普遍的概述。[3]未付梓的有：路易斯·格拉纳达修士（Luís de Granada, 1504-1588）的教理问答书；[4]对圣母玛利亚教堂圣礼的学院派解释；[5]《蔑视世界》（*Contemptus mundi*）。[6]

在修会生活期间，阳玛诺神父始终表现出伟大而卓越的美德。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上级，他身上总是凸显着无比的谨慎和非凡的耐心。他在领导和管理下属时表现出谨慎、耐心，如此温和亲切地下达命令，以至于下属们乐意执行他的命令。他在许多场合都表现出耐心，在这么多年的历程中，他极少表现出一点点的不满和情绪。尤其是他非常能够忍耐，由于天主的旨意，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里，因双目失明不耐烦的时刻多了些。神父极其严格地遵守规则，话语很少，即使是在恰当时分说的话，也非常有分量和分寸，且从未听他讲过别人的过错，无论多么轻微。

阳玛诺神父对圣体圣事、主基督的受难和圣母怀有特别的虔诚。当他谈

1 《圣经直解》,《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17-19 册，第 287-624，1-660，1-582 页。据阳玛诺自序，此书应完成于崇祯丙子即 1636 年。

2 《天主圣教十诫直诠》。

3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诠》,《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27 册，第 447-582 页。

4 暂未确定此为何书。格拉纳达，多明我会士、神学家，生于格拉纳达，著有多部书籍。

5 暂未确定此为何书。

6 即《轻世金书》。阳玛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应为天文书《天问略》，或因此书乃科学书籍而未被列于讣告中。《圣教信证》所列阳玛诺著述有《圣经直解》《十诫真戒》《景教碑诠》《天问略》《轻世金书》《避罪指南》《圣若瑟行实》《天神祷文》，见韩霖、张赓述，《圣教信证》，第 47 页。其中《天神祷文》或即《圣若瑟祷文》。阳氏中文著述还有《代疑论》《天学举要》《默想书考》《钦主孝亲礼仪》以及同其他耶稣会士合译的《圣教日课》及《圣教总牍》等。

到这些至高无上的奥秘时，难以相信他是多么激动与虔诚，他是多么热泪盈眶，以至于他在晚年长期的疾病中，似乎忘记了折磨他的痛苦，当他思考或谈论这些事情时，使听众们也非常虔诚。最后，阳玛诺神父接受了圣礼，在一个星期五（如前所述，概因神父对主的受难非常虔诚）离开了人世。

教徒们得知阳玛诺神父去世，认为自己就像没有牧人的绵羊，没有父亲的孩子，没有监护人的孤儿，他们立即匆匆涌向教堂，虔诚地为神父的灵魂祈祷流泪，并连续多日频繁地做弥撒和其他虔诚的活动，直到安葬神父，陪同至墓地。阳玛诺神父的墓地在很远的城墙外，非常庄严，大约有三百名教徒陪伴着他，每人都点着蜡烛，手里拿着念珠，他们谦卑的行动和虔诚的祈祷深深打动了异教徒。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总督[1]虽是异教徒，却是我们的好朋友，他的教徒妻子阿戈达（Agoda）得知神父去世后，送来了大量的香烛，听说神父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前往墓地，她感到非常欣慰。"[2]

上述讣告简明扼要地描述了阳玛诺的人物特征。首先，阳玛诺长期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承担管理传教区的重要职责，获得上级与下属的赞扬。其次，阳玛诺刻苦学习中文，汉文水平高，著述丰厚，积极践行了书籍传教策略。最后，除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外，阳玛诺在生活中是一个谨慎耐心、温和亲切、隐忍少言且严格遵守规则之人。

五、结论

阳玛诺是明清来华耶稣会士中的一名，他在众多性格迥异、个性鲜明的传教士中似乎显得格外普通，或许其谨慎少言、严格自律、温和服从的性格特征使其

1 佟国器，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 262-266 页。佟国器于顺治十六年（1659）为阳玛诺《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作序。

2 Feliciano Pacheco, Carta ânua da vice-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o de 1660, fls. 717v-719.

在历史记述中相对“默默无闻”。然而，通过对阳玛诺在华活动的研究，可以发现阳玛诺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从中国天主教史的角度来看，阳玛诺在华半个世纪的活动轨迹可谓中国天主教史在这一时期的缩影，期间中国天主教会经历了利玛窦去世后的平稳发展，南京教案的沉重打击，教案后的恢复与扩张，托钵修士入华与福建教案引发的波折以及明清战争造成的破坏。作为在华耶稣会的领导人物，阳玛诺在南京教案后恢复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在担任耶稣会首任中国副省会长期间促进了传教区的稳定和发展。

从中西交流史的角度来看，阳玛诺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叶向高等著名信教、友教士人交往颇多，作为明清中国的“边缘人物”，亦曾两度进京，结交朝中官员，推动译书修历计划，参与募兵铸炮之事。阳氏所编撰的天文与宗教书籍是明清中西科学与思想文化交流的见证。

利玛窦于 1610 年去世，阳玛诺恰于此年进入中国内地，其在华经历尤其体现了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士对适应策略的重新确认与最终选择。在本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阳玛诺在南京教案爆发后对适应策略的认可，在争取耶稣会士在华合法活动中对书籍与科学传教策略的运用，在译名之争中对术语本土化的赞同，在礼仪问题与福建教案中对中国礼仪的容忍。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先生在《利玛窦：因人成己》一文中证明，“利玛窦规矩”并非利玛窦个人独创的结果，中国这一“他者”在“利玛窦规矩”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正是他者塑造了利玛窦。[1]阳玛诺对利玛窦传教方法的继承与中国本土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是阳氏在与中国本土环境的持续互动中做出的选择，受到其个人在华经历的深刻影响。“利玛窦规矩”的形成离不开“他者”，利玛窦的继承者们同样受到了中国环境与自身经

1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著，代国庆译，《利玛窦：因人成己》，《学术研究》2012 年第 8 期，第 86-92 页。

历的塑造。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lesu (ARSI), Japonica-Sinica (JS): 15-Ⅱ, 16-Ⅱ, 17, 18-Ⅰ, 113, 114, 115, 121, 142, 161-I, 161-Ⅱ.

Biblioteca da Ajuda (BA), Jesuítas na Ásia (JÁ): 49-Ⅳ-61, 49-V-4, 49-V-5, 49-V-6, 49-V-7, 49-V-8, 49-V-14.

Brockey, Liam Matthew.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Brockey, Liam Matthew. *The Visitor: Andre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Dunne, George H.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González, José Maria.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Ⅰ (1632-1700)*. Madrid: Imprenta Juan Bravo, 1964.

Gouvea, António de.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Edição,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 de Araújo.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Oriente &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 1998.

Leitão, Henrique. "The Contents and Context of Manuel Dias' Tianwenlüe," in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I: The Jesuits, the Padroado and East Asian Science (1552-1773)*. Edited by Luís Saraiva and Catherine Jami.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8, pp. 99-121.

Menegon, Eugenio. "Jesuits, Franciscans and Dominicans in Fujian: The Anti-Christian Incidents of 1637-38," in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Edited by Tiziana Lippiello and Roman Malek. Sankt Augustin &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7, pp. 219-262.

Meynard, Thierry and Canaris, Daniel eds. *A Brief Response o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Shangdi, Tianshen and Linghun*.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Navarrete, Fernández de. *Controversias Antiguas y Modernas entre los Missionarios de la Gran China*. Madrid, 1679.

Rule, Paul A. *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 Allen & Unwin, 1986.

Wyngaert, P. Anastasius Van den ed.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Quaracchi-Firenze: Apud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1933.

《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66.]

陈拓。《在中国发现西学：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世界背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 [CHEN, Tuo. *Discovering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The Global Context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26.]

陈占山。《葡籍耶稣会士阳玛诺在华事迹述考》。《文化杂志》1999 年第 38 期，第 87-96 页。 [CHEN, Zhanshan.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Portuguese Jesuit Manuel Dias Junior in China". *Review of Culture*, No. 38, 1999, pp. 87-96.]

董少新。《〈1645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南部年信〉译注并序》。待刊稿。 [DONG, Shaoxin. "Translation, Annot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Annual Letter of 1645 of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the Jesuit Vice-Province of China". Forthcoming.]

董少新。《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DONG, Shaoxin. *The Portuguese Jesuit António de Gouvea in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7.]

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第 65-86 页。 [DONG, Shaoxin and HUANG, Yinong.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Recruitment of Portuguese Soldiers from Macao during Emperor Chongzhen’s Reign”. *Historical Research*, No. 5, 2009, pp. 65-86.]

董少新、刘耿。《〈1618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上）。《国际汉学》2017 年第 4 期，第 133-146 页。 [DONG, Shaoxin and LIU, Geng. “Translation, Annot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Annual Letter of 1618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 4, 2017, pp. 133-146.]

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张旭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Sachsenmaier, Dominic.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 Translated by ZHANG, X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2.]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自印本，1969。 [FANG, Hao. *Fang Hao’s Sixtieth Anniversary Self-Selected Works*. Taipei, 1969.]

方豪。《李之藻研究》。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 年。 [FANG, Hao. *A Study of Li Zhizao*. Beijing: Dolphin Books, 2016.]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FANG, Hao. *Biographies of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Catholicism in China*.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7.]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Pfister, Louis.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Translated by FENG, Chengj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高龙鞏。《江南传教史》。周士良译。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 [Colombel, Augustinus M.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Translated by ZHOU, Shiliang.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2009.]

韩霖、张賡。《圣教信证》。载张西平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38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 [HAN, Lin

and ZHANG, Geng. “Shengjiao Xinzheng.” In ZHANG, Xiping et al. eds. *Collectanea of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in the Vatican Library*, I, vol. 38,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14.]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 年。 [HUANG, Yinong. *The Hongyi Cannon and the Ming-Qing Wars*.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2.]

李天纲编。《徐光启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LI, Tiangang ed. *Collected Works of Xu Guangq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1.]

刘耿、董少新。《〈1621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海洋史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395-440 页。 [LIU, Geng and DONG, Shaoxin. “Translation, Annot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Annual Letter of 1621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China”. *Studies of Maritime History*, No. 2, 2020, pp. 395-440.]

刘耿、董少新。《〈1644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文化杂志》2017 年第 100 期，第 72-102 页。 [LIU, Geng and DONG Shaoxin. “Translation, Annot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Annual Letter of 1644 of the Jesuit Vice-Province of China”. *Review of Culture*, No. 100, 2017, pp. 72-102.]

刘耿。《利玛窦墓园的前七年（1610-1616）》。《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111-120 页。 [LIU, Geng. “The Cemetery of Matteo Ricci [and Other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Its First Seven Years (1610-1616)”.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No. 1, 2018, pp. 111-120.]

罗登瀛修，乐纯青纂。《通山县志》。清同治七年活字本。 [LUO, Dengying and Yue, Chunqing, *Tongshan Xian Zhi*, 1868.]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Dehergne, Joseph.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Translated by GENG, S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SONG, Boyin ed. *Chronicle of Wang-zheng*.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万明。《晚明南京教案新探》。载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第 141-155 页。[WAN, Ming. "A New Study of the Nanjing Religion case in the Late Ming". In WANG, Chunyu ed. *Studies in Ming Histo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7, pp. 141-155.]

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Väth, Alfons.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Translated by YANG, Bingchen.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2015.]

肖清和。《"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 [XIAO, Qinghe. *The Heavenly Association and Our Party: A Study of Catholic Communiti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

阳玛诺。《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诠》。载张西平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27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 [YANG, Manuo (Manuel Dias Júnior). "Jingjiao Liuxing Zhongguo Bei Song Zhengquan." In ZHANG, Xiping et al. eds. *Collectanea of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in the Vatican Library*, I, vol. 27,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14.]

阳玛诺。《轻世金书》。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Chinois 7133。 [YANG, Manuo (Manuel Dias Júnior). *Qingshi Jinshu*.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Chinois 7133.]

阳玛诺。《圣经直解》。载张西平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17-19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 [YANG, Manuo (Manuel Dias Júnior). "Shengjing Zhijie." In ZHANG, Xiping et al. eds. *Collectanea of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in the Vatican Library*, I, vols. 17-19.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14.]

阳玛诺。《天问略》。载张西平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2 辑第 3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年。 [YANG, Manuo (Manuel Dias Júnior). “Tianwen Lüe.” In ZHANG, Xiping et al. eds. *Collectanea of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in the Vatican Library*, II, vol. 3,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19.]

阳玛诺。《天主圣教十诫直诠》。法国国家图书馆藏，Chinois 7192。 [YANG, Manuo (Manuel Dias Júnior). *Tianzhu Shengjiao Shijie Zhiji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Chinois 7192.]

姚立澄。《关于〈天问略〉作者来华年代及其成书背景的若干讨论》。《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156-164 页。 [YAO, Licheng. “On the Date of Tianwenlue’s Author Coming to China and Other Background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no. 2, 2005, pp. 156-16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YONG Rong et al.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张维华。《晚学斋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6。 [ZHANG, Weihua. *Wanxuezhai Collected Papers*. Jinan: Qilu Press, 1986.]

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 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9。 [ZHANG, Xianqing. *Government, Family Clans and Catholicism: A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Rural Fu-an in the 17th and 19th Centu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郑诚辑校。《李之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 [ZHENG, Cheng ed. *Collected Works of Li Zhiz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8.]

钟鸣旦。《利玛窦：因人成己》。代国庆译。《学术研究》2012 年第 8 期，第 86-92 页。 [Standaert, Nicolas. “Matteo Ricci: Shaped by the Chinese”. Translated by DAI, Guoqing. *Academic Research*, no. 8, 2012, pp. 86-92.]

钟鸣旦。《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圣神研究中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Standaert, Nicolas. *Yang Tingyun,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 Translated by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2.]

周孝雷。《巡城御史孙光裕参与南京教案史实考论》。《世界宗教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16-131 页。 [ZHOU, Xiaolei. "A Historical Research on Sun Guangyu's Involvements in the Nanjing Anti-Christian Movement".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3, 2021, pp. 116-131.]

周岩编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ZHOU, Yan ed. *New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Catholicism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3.]

Journal of Research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ISSN: 3068-479X)
中国基督教研究（ISSN：3068-479X）| CCSpub.cc/JRCC | CC BY-NC-ND 4.0
2026 年 12 月第 27 期，第 222-263 页 | No. 27, 2026, pp. 222-263

Jesuit Manuel Dias Júnior in China (1610-1659)

Wenxin XIE https://orcid.org/0009-0004-2340-809X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wenxingabriela@163.com

Abstract: Manuel Dias Júnior is an important Jesuit in the history of Catholicism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ias entered the mission in 1610 and died in Hangzhou in 1659, having been in China for about half a century. He translated Western astronomical and calendar books in Beijing, was recommended for the recruitment of Portuguese soldier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rtillery, went through three religion cases of Shaozhou, Nanjing, and Fujian, was the Vice-Provincial of Jesuit province of China twice and totally for 18 years, and preached in Zhejiang, Jiangxi, Fujian and other provinces. As a leading figure among the Jesuits in China, Di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toration of Jesuit enterprise in China after the Nanjing religion case,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ssion while being the first Vice-Provincial. Having friendship with Xu Guangqi, Li Zhizao, Yang Tingyun, Wang Zheng, Ye Xianggao and other Chinese Christians or sympathizing literati and officials, devoted to realizing the modification of Chinese calendar with Western books, and having compiled several astronomical and Catholic books, Dias contributed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environment and his own experience in China, Dias put into practice the policy of accommodation that was formed by Matteo Ricci.

Keywords: Manuel Dias Júnior, Jesuit, accommodation, Ricci method, History of

Catholicism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612_(27).0008
Submitted Date: Jul. 22, 2026
Accepted Date: Aug. 18, 2026
Published Date: Nov. 9, 2026